

1350  
56325

400740

成都工学院图书馆

基本馆藏

中国近代史丛书

# 北洋军阀

上海人民出版社

702

50  
325

统一号书: 11171·29

定 价: 0.14 元

中国近代史丛书

# 北洋军阀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丛书》

北 洋 军 阀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5 字数 47,000

1973年1月第1版 197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0

统一书号：11171·29 定价：0.14元

## 毛主席语录

从袁世凯以来，北洋军阀强调专制的统一。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和这些军阀的志愿相反，所得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最后是他们自己从台上滚下去。

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等，他们都想镇压人民，但是结果都被人民推翻。

## 编写说明

为了适应广大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学点历史的需要，我们编写这套《中国近代史丛书》，介绍些近代史的基本知识，以供阅读参考。

这套丛书，包括重大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等，以及若干近代历史人物，陆续出书。每本约四万到六万字。

我们这个编写组，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同志组成的。我们的思想和业务水平有限，编写出来的东西很粗糙，甚至可能存在错误，热忱地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 目 录

- 一、一支反革命武装的建立····· 1
- 二、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10
- 三、专制独裁的军阀统治·····22
- 四、洪宪帝制丑剧·····30
- 五、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39
- 六、张勋复辟·····45
- 七、军阀的激烈争夺·····52
- 八、人民的苦难与反抗·····59
- 九、北洋军阀的覆灭·····67

## 一、一支反革命武装的建立

北洋军阀,是清朝末年由袁世凯开始建立的封建的、买办的反革命武装政治集团。从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国民党新军阀反动统治建立前,是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时期。

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命令袁世凯在天津附近的小站地方,训练“新建陆军”。这支反革命武装,是适应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维护反动统治的需要而建立的。它是北洋军阀的起源。

清朝原来的军队,是“八旗”和“绿营”。但是从十八世纪末开始,随着清朝政府政治上的日益腐败,八旗和绿营也都已腐朽不堪。平时,敲诈勒索,欺压百姓,或聚开赌场,或忙于做生意;战时有的“雇人代充”,有的“临阵脱逃”,战后“则杀民邀功”。经过十八世纪末白莲教起义、十九世纪初天理教起义,以及反对英国侵略者发动的鸦片战争,无论八旗或者绿营,都明显地表现出不能发挥维护清朝统治的作用了。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政府准许地方暂办防军、练勇、团练,作为地方性的暂编军队,以弥补八旗和绿营的不足。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清朝政府为了反对人民革命，命令各地筹办团练。曾国藩(音凡 fán)建立的“湘军”，李鸿章建立的“淮军”，都是在团练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清朝政府的国家常备军的。

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后期，清朝部分军队已改习洋枪、洋操。一八六二年，由安庆开赴上海的淮军，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就开始了这种改革。一八六五年，清朝政府又命令三口通商大臣、兵部侍郎崇厚，率军一千五百人，赴京、津一带，选择标兵，进行洋操训练。一八六七年，恭亲王奕訢(音亦辛 yìxīn)提出，要以洋枪、洋操训练军队，在北京一带“设立六军，借资拱卫”。随后，曾国藩提出以新械练兵，在沿海七省练陆军九万，沿江三省练三万。一八七六年，李鸿章选拔海防营内下级军官七人，赴德国学习；一八八三年，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一八八五年，又设立北洋武备学堂。

可是，湘军和淮军同样日益腐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无不败，陆军节节溃退，海军全军覆灭。清朝政府为了支撑危局，镇压人民革命，决定建立一支新式的反动武装。因此，甲午中日战争后，“是为练新军之始”。袁世凯训练的新建陆军，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出现的。

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河南项城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是近代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清朝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遭到严重失败后，袁世凯竭力主张训练新军以代替旧军。通过一系列钻营，袁世凯弄到了一个浙江温处道的官职，但未上任。他邀集了一伙人译撰兵书，又接

受西太后宠臣荣禄的指示，拟出新建陆军的各种规章制度。后来，醇(音纯 chún) 亲王载沣(音丰 fēng)、庆亲王奕劻(音匡 kuāng) 会同军机大臣，奏请光绪帝改变军制，保举袁世凯训练新军。这样，袁世凯以一个道员的身份，取得了督练新军的职权。

早在一八九四年冬天，清朝政府任命淮系官僚、长芦盐运使胡燏棻(音育芬 yùfēn)，在离天津七十里的小站地方训练“定武军”。定武军是一支新式陆军，由德国人汉纳根担任教官，根据德国陆军教条训练。后来，胡燏棻被任命为督办津芦铁路，清朝政府决定将定武军交由袁世凯接统，继续训练。这支军队在定武军四千多人的基础上，扩充至七千人，成为一支新建陆军。

袁世凯训练的反革命武装，所以被称为新建陆军，“新”在它不同于旧式军队，是仿照德国和日本的建制。它用新式武器装备，拥有步、骑、工程、辎重等兵种；各级军官大多数由军事学堂毕业的人充任。它对新兵的选拔，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伍要求，有年龄、体格及识字程度等规定；还设有步兵学堂、炮兵学堂、工程兵学堂等，推行新的军事教育。

袁世凯从一开始，就爱兵如命，看重“有军则有权”的原则。

在新建陆军中，袁世凯首先一着，就是搜罗党羽。他成立“新建陆军督练处”，把他的老友、由他家资助到北京考中进士的徐世昌，调来担任参谋。又调来冯国璋、段祺(音其 qí) 瑞、王士珍，分别担任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务处总办、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工程兵学堂总办兼工程兵统带。冯国璋从

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在一八九五年秋曾充任过驻日公使裕庚的随员，段祺瑞在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曾被送去德国学习陆军，是当时具有一定近代军事知识的人。他们都被袁世凯重用，成了袁的忠实爪牙。此外，原定武军中的将领曹锟（音昆 kūn）、卢永祥、段芝贵等，也被袁世凯委任为各队队官（相当于后来的连长）。其他方面的人员，只要能为袁世凯卖命的，袁都不遗余力地加以搜罗，如准军旧部张勋、倪嗣冲等。袁世凯纠集和培植的这一大批爪牙，就是后来北洋军阀武装政治集团的班底。

从小站练兵起，袁世凯就在这支反革命武装中推行“招募制”，实际上是雇佣制，灌输袁是士兵“衣食父母”的意识，以专制独裁的封建纪律束缚士兵。袁世凯还在这支反革命武装中，聘请了不少帝国主义分子担任教官，其中德国人最多。这支反革命武装，就成了袁世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资本。

一八九八年，袁世凯依靠这支反革命武装，采取两面派手法，破坏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戊戌（音物须 wùxū）变法。当时，康有为等人组织维新团体——强学会，袁世凯入会赞助。由于这种关系，袁世凯得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保举，从光绪帝那里取得了特赏侍郎专办练兵事宜的职务。也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改良派密访袁世凯，请他参加当时决定改良派命运的计划，即当西太后准备在天津阅兵、利用荣禄军队废弃光绪帝的时候，袁世凯率军队救光绪帝出险，恢复帝权，并诛杀荣禄。袁世凯一口承诺下来。可是，时隔一日，正是这个袁世凯，就向荣禄和西太后告密。于是，西太后重新听政，禁闭光绪帝，并

杀了谭嗣同等六人。戊戌变法失败了。袁世凯以血腥叛卖的手段，换得西太后和荣禄的信任，从此变成政治舞台上颇为重要的人物。

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〇年，袁世凯依靠他的反革命武装，在山东血腥地镇压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当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山东爆发时，一八九九年底帝国主义要清朝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以代替毓（音育 yù）贤。帝国主义所以特别赞赏袁世凯，就是因为他有一支新式的反革命武装。袁世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到山东后，大肆屠杀革命人民，乘机又奏准扩充马、步、炮队二十营，并联合青岛德国侵略军、各地教堂武装，残酷镇压义和团。袁世凯还忠实地替帝国主义效劳，当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军进攻中国时，伙同刘坤一、张之洞等卖国贼，参加帝国主义的分裂活动——“东南互保”，并在山东拥兵自固，采取观望态度。当时人们称他为“山东王”。

中外反动派十分赏识袁世凯。卖国贼李鸿章临死前推荐袁世凯说：“国内的人才，没有一个比袁世凯更能干的了。”帝国主义也认为袁世凯是“强人”，竭力向清朝政府表示，要袁世凯继任李鸿章的职位；德国驻北京公使穆默说：对此各国公使一致赞成。一九〇一年李鸿章死去，袁世凯就继李鸿章之后，担任了当时举足轻重的直隶（音历 lì，直隶即今河北）总督兼北洋大臣。

经过义和团运动和经过帝国主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清朝政府在北方的主要军队——宋庆、聂士成、董福祥的军队，都被打垮了，只有袁世凯的军队完整地保存，并得到扩充。

而清朝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向帝国主义彻底投降，更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一九〇一年一月，西太后等人逃到西安，喘息方定，立即发布“新政”上谕，表示要力图振作。“新政”的主要内容是练兵筹饷，即所谓“时事多艰，练兵实为急务”。正说明清朝政府在当时情势下，为了维护反动统治，还要进行垂死挣扎。

一九〇三年开始，清朝政府改革兵制，淘汰绿营，在北京设立练兵处，以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帮办大臣，统一和扩充全国新军的编制，计划在全国共编新军三十六镇（相当于后来的师）。但是，这个计划直到清朝政府被推翻为止，也没有完成。

袁世凯乘推行“新政”的机会，进一步扩充他的军队。他先将带到山东的军队调回直隶，驻营小站，进行扩充，改编为“北洋常备军”。按照北洋常备军的编制，每镇官兵共一万二千五百一十二人。一九〇三年，北洋常备军左镇组成，就是后来的北洋第二镇；第二年，北洋常备军右镇组成，就是后来的北洋第四镇。

一九〇三年，袁世凯还将亲信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安插到练兵处，分任总提调、军学司正使、军令司正使、军政司正使等要职，掌握着实权。同时，清朝政府命铁良会同袁世凯，办理训练“京旗常备军”事宜，一切仿照北洋常备军的编制规定，实际上归于北洋系统。这就是后来的北洋第一镇。

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日本和沙俄为了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了帝国主义性质的“日俄战争”。

袁世凯乘机又向清朝政府提出进一步扩军的计划。将旧军“武卫”等，改编为北洋第三镇；以第二镇一部分和“武卫右军”先锋队，合并扩编为北洋第五镇；接着又以第三镇一部分和“武卫”等旧军的编余部队，合编成北洋第六镇。到一九〇五年，按照原定的编练计划，北洋军六镇建成。

当时各省练军计划都没有完成，唯独北洋军却能完成。这是因为，清朝政府把北洋军作为国家军队，是直接拱卫京师和驻防直隶的武装，因而尽力扩充。其他各省所练新军，是属于地方军，清朝政府采取限制的政策，如湖北就由两镇减为一镇一协（相当于后来的旅）。同时，袁世凯爬上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练兵大臣等重要职位后，地位在各省督抚之上，竭力扩充兵力以为己用。北洋军六镇建成，共扩军达七、八万人。除第一镇由户部侍郎、满人铁良为统制外，其余五镇均由袁世凯的部下王英楷、曹锟、吴凤岭、吴长纯、段祺瑞为统制，成为袁世凯的嫡系部队。

早在一九〇二年，袁世凯从北洋各镇抽调三千人，编成巡警，在保定设警务局，由赵秉钧负责。赵秉钧当时是直隶候补道，被委办巡警。一九〇四年，袁世凯在天津设巡警，赵秉钧又担任天津巡警道。一九〇五年，北京发生革命党人刺伤出洋考察宪政大臣事件，袁世凯乘机建议设立巡警部，并推荐亲信徐世昌、赵秉钧担任尚书和侍郎，从而掌握了清朝政府的巡警权。

袁世凯以“筹饷”练兵，来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一九〇二年，他从买办官僚盛宣怀手中，夺取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和

部分铁路的权力，并创办印花税。一九〇三年，设立督销盐局，垄断食盐的销售。一九〇四年，又设局铸造铜元，发行公债，对人民进行搜括。袁世凯还扶植买办资本。官僚买办梁士诒（音移 yì），就是他培养起来的。梁士诒起初是袁世凯的幕僚，一九〇五年任铁路总公司总文案，一九〇七年任京汉、沪宁、道清、正太、汴洛五铁路提调，后任铁路局长兼交通银行帮理，成为“交通系”买办资本集团的首领。

袁世凯本身就是个大地主、大买办。他在河南占有土地四万亩；袁氏家族在河南彰德，占有全县土地的三分之一。他利用政治势力，同比利时合办临城煤矿，又办滦（音鸾 luán）州煤矿公司，后来与开平煤矿合并为开滦煤矿公司，由他的长子袁克定当董事长。

一九〇七年，清朝政府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唐绍仪、段芝贵分任奉天、黑龙江巡抚，这些人都是袁世凯的亲信。袁世凯将北洋第二镇、第四镇抽调一部分编为混成协（相当于后来的独立旅），由王汝贤率领去东北。此外，河南、江苏成立了一些混成协，都是从北洋军孳生编成的。几年中，袁世凯的势力已遍布于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和东三省各地了。

随着北洋军的扩充，袁世凯和他的亲信都担任要职，结成死党，逐步形成一个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反革命武装政治集团——北洋军阀集团。

近代中国军阀的开山祖，是曾国藩、李鸿章。北洋军阀是他们的后代，袁世凯正是继承了他们的反革命衣钵（音播 bō）。在近代中国，“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

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sup>①</sup>。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军阀反革命势力，正是依靠他们掌握的反革命武装而发展起来的。

---

<sup>①</sup>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一一页。



## 二、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

袁世凯的军队扩充得越来越多，权力越来越大，这就引起了清朝皇族的妒忌和猜疑。于是，清朝皇族和袁世凯展开了一场夺取兵权的争斗。一九〇六年冬，清朝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将北洋军四个镇收归陆军部直接统辖，夺去了袁世凯四个镇的兵权。一九〇七年，清朝政府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任命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迫令交出全部兵权。袁世凯不愿离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声称对新职力不胜任，要求清朝政府收回这一命令，以便保住自己的兵权。清朝政府则以袁世凯向来办事认真，不怕辛苦为理由，叫他不要再推托。袁世凯莫可奈何，只好接受命令，交出兵权。

一九〇七年，袁世凯担任外务部尚书后，利用职务的便利，进行卖国活动，以求结好于帝国主义。他指使唐绍仪在东北进行卖国活动，将新(民)法(库)铁路和东三省银行的主权出卖给美国。一九〇八年，他不顾当时中国人民收回路权的要求，又将津浦铁路出卖给英国、德国，将沪杭甬(音勇 yǒng)铁路出卖给英国。在短短两年中，袁世凯干了这么多卖国活动，充分说明他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

一九〇八年，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皇位由载沣（光绪帝的弟弟）的三岁儿子溥（音普 pǔ）仪继承，改年号为“宣统”，载沣为摄政王。这时，清朝皇族与袁世凯的矛盾，更加尖锐了。为了加强皇族集权，载沣同军机大臣张之洞密商杀掉袁世凯，但遭到张之洞反对；载沣又征求一些将领的意见，他们怕北洋军“士兵有变”，也不同意。外国侵略者知道后，也对载沣施加压力，保护袁世凯。最后，载沣只得硬说袁世凯脚有毛病，把他赶回河南老家“养病”。

袁世凯虽然被赶回老家，但是由于有帝国主义支持和唯袁命是从的北洋军队作为资本，依然是一个反革命的实力人物。国内一旦政治风云变幻，他就会乘机再起。

一九一一年十月，孙中山领导的、酝酿已久的辛亥革命爆发了。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全国有十四个省宣布脱离清朝政府。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形成了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潮。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sup>①</sup>

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外交使团曾经讨论武装干涉的问题，但因帝国主义之间矛盾重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得帝国主义感到公开进行武装干涉，已很难达到目的。于是，他们决定采取间接的方式，来破坏中国革

<sup>①</sup>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命。帝国主义看到清朝政府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继续扶植它不是个好办法，就伪装“中立”，以便寻找新的走狗，来继续维持对中国人民的统治。

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感到，清朝政府在人民革命的冲击之下，已经统治不下去了，要求变更统治形式，继续奴役中国人民。他们要反对革命，又要抛弃清朝政府，因此也需要在当时的反革命人物中，找出新的代理人。

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很快物色到自己新的工具，这就是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当时，在他们中间流传着“非袁莫属”的说法，帝国主义则叫嚣“非袁不能收拾”。这是国内外反动派发出的支持袁世凯、反对革命的呼声。

袁世凯被赶回老家后，就把自己伪装起来，有时在河南彰德洹（音环 huán）上村的洹水上，打扮成一个“渔翁”，装作寄情于山水之间的样子，好象对政治已不感兴趣。其实，他无时无刻不在窥测方向，以求东山再起。他在清朝政府的中央和地方，特别是在北洋军队中，布满了心腹和爪牙。一九一一年，徐世昌担任内阁协理大臣，段祺瑞担任江北提督，冯国璋担任军諮（音咨 zī）府（相当于后来的参谋部）军諮使。北洋军六镇虽然归陆军部直接统辖，但六镇的统制，大都仍是袁世凯的亲信。他同各国使馆保持着联系，特别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往来甚密。他家里设有电报处，京内消息，立即可达，朝中大事，没有一件瞒得过他。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立即活跃起来，紧张地和各方面进行联络。

武昌起义后，清朝政府把北洋军改编为三个军，以第一、

第二军开赴湖北武汉镇压革命，由陆军大臣荫（音印 yīn）昌统辖，先后任命冯国璋、段祺瑞为军统；第三军守卫北京一带。被派往湖北镇压革命的冯国璋，并没有立即前往，而是先到河南彰德，向袁世凯请示。袁世凯指示冯国璋放慢军事行动，看看风色再说。这实际上是向清朝政府说：你如果不给我权力，我就不能够保护你。这样，尽管清朝政府“讨伐令”早已下达，北洋军并不积极行动，清朝皇室荫昌也指挥不动。

帝国主义马上出来为袁世凯撑腰。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在外交团的会议上，提出促使清朝政府起用袁世凯的主张，得到大多数公使同意。美国并被推为代表，向清朝政府提出要求。

大地主、大官僚也纷纷要求起用袁世凯。军机大臣、内阁协理那桐提出辞职，并举袁世凯代替，说：“大势已经如此，不用袁世凯，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凯，可以延迟灭亡，或可不亡。”

十月十四日，清朝政府下令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接到命令，知道清朝政府非起用自己不可，但是没有交出更大的权力，因此决定暂不出山。他打电报给清朝政府，推说“脚病”还没有治好，把命令顶了回去。十月二十日，内阁总理奕劻，只好叫徐世昌到彰德去劝驾。徐世昌带回袁世凯的六个条件：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此次起事诸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之军费。这六个条件中，一、三、四项是想用以麻痹革命党人，瓦解革命，收买立宪派为他效劳；二、五、六项则是想废除“皇族内阁”，迫使清朝政府

把全部权力交给他。载沣当然不肯答应。坚持到十月二十七日，清朝政府又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统辖湖北水陆各军，但他还是不肯出来。

到十月底，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帝国主义再次促使清朝政府起用袁世凯，让他掌握军政大权。大地主、大买办和立宪党人，也群起向清朝政府提出同样要求。正在



袁世凯亲往德国使馆进行勾结的丑态

这时，北方革命党人也在积极进行活动。十一月一日，清朝政府不得不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要他入京组阁，实际上是向袁世凯交出了军政大权。

袁世凯组阁，帝国主义拍手称快。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在给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复电中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美国驻华公使在外交团的会议上，更进一步提出“保障袁世凯的地位，并给以便宜行事的机会”的建议。各国公使表示赞同，并委托公使团团团长朱尔典，“以私人方式同袁世凯交换意见，讨论如何采取更好行动的办法”。袁世凯对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也感激不尽，亲往各国驻华使馆进行勾结，密谋绞杀辛亥革命的具体措施和办法。

在帝国主义策划下，袁世凯一上台，就把清朝皇族、军谕府大臣载涛的职务和统率的禁卫军兵权夺取过来，派心腹徐世昌任军谕府大臣，从汉口调回冯国璋统率禁卫军。不久，袁世凯又顺利地把摄政王载沣赶下台。这样，清朝政府的中央政权，完全掌握在袁世凯手中。

十一月六日，袁世凯派人把准备在北方起义的革命党人、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刺死。吴禄贞，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被派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陆军，曾参加湖南革命团体——华兴会。一九一〇年十二月经清朝皇族良弼（音必 bi）推荐，接替段祺瑞，升任第六镇统制。武昌起义后，他在北方积极策划起义，赴滦州联络清军第二十镇将领共同行动。山西独立后，清朝政府任命吴禄贞为代理山西巡抚，要他带兵前往镇压。吴禄贞乘

机率军到石家庄，与山西革命军联络，准备互相配合，直捣北京。这对袁世凯是个巨大威胁。于是，袁世凯派人把他刺死，随后又把参加起义计划的军官调走，派亲信直接统率这支军队，使北方革命党人的起义宣告流产。

接着，袁世凯对山西发动军事进攻。十二月二十日占领太原，山西军败退到包头一带。他还指使与他有密切关系的山东都督，取消山东独立。收买同盟会叛徒汪精卫作内奸，破坏北方革命党人的起义。袁世凯完全控制了北京和周围各省后，便对南方革命党人进一步施加压力，以便窃取革命果实。

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有民主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异常软弱，又有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他们在辛亥革命时，对帝国主义仍然存在幻想，不愿也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他们不去解决土地问题，不去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进行革命，对当时已经掀起的广泛的群众斗争，也没有给予支持和领导，反而抛弃群众，甚至镇压群众，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便被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袁世凯看穿了，从而对它施加压力，迫使它妥协、屈服。

袁世凯对付南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采取的仍是反革命两手策略。他利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又打又拉，软硬兼施，以武力为后盾，“和平谈判”为手段，达到窃取国家政权的目的是。

袁世凯先利用北洋军队的力量，给武汉的革命军一个严重打击，继占领汉口之后，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占领汉阳，在龟山上用大炮对武昌轰击，但却不渡江占领武昌。这就是向革命军方面说：你如果不和我妥协，我就能够绞杀你。袁世凯的军事进攻，吓得窃据湖北军政府都督位置的黎元洪逃离武昌，担任民军总司令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之一的黄兴，也从武汉搭船到上海去了。这时，袁世凯经过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密商，由驻汉口英国领事出面，向双方提议停战。武汉方面自然同意。袁世凯随即直接拍发电报，提议“和谈”。

十二月，双方进行谈判，袁世凯派出代表唐绍仪，革命军方面派出代表伍廷芳，谈判地点原定在武汉，后来改在上海。

在谈判中，帝国主义驻华公使举行会议，由沙俄公使提议，向南北双方代表提出照会，强调“双方代表注意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之必要”，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混入革命阵营的旧官僚，不用说是愿意奉袁世凯做自己新主子的。临时附和起义的立宪党人，也希望经过袁世凯而分享权力，因而也竭力拥护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在这方面，立宪党人张謇（音简 jiǎn），起了重要的作用。张謇，一八九四年中状元，后来开办南通大生纱厂等企业，是江苏的大资本家。张謇和袁世凯早有交情。一九一一年六月，作为当时江苏諮议局局长的张謇，曾到河南彰德拜访袁世凯，袁对张说：“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你的意旨而行。”此后，张、袁之间进一步建立了联系。武昌起义后，张謇立即暗中策划，为立宪派篡夺江浙地方政权。袁世凯



组阁，提名张謇担任农工商部大臣。在谈判中，张謇身居幕后操纵，形式上的会议是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实际的幕后协商，却在张謇等立宪派秘密集会的地点进行。张謇不断向袁世凯提供情报，替袁世凯出谋献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张謇出任实业总长、盐务总理，将所掌握的两淮盐税扣留四分之三，使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更加困难，给孙中山施加压力。他密电袁世凯说：“清朝皇帝先退位，接着就拥护你当总统，东南各方面的人，一切都可通过。”

资产阶级革命党自身的弱点，这时也更加暴露，同盟会分崩离析，流传着“革命军起，革命党销”的论调。多数革命党人，希望只要能保留“共和”的形式，就同意袁世凯做大总统。在革命党人一片妥协声中，黄兴曾打电报给袁世凯说：“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同一天，也打电报给袁世凯说，“暂时承乏，虚位以待”，表示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愿意推他为大总统。

但是，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对孙中山仍有怀疑，决定进行威胁。就在孙中山宣誓就职的那天，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密电唐绍仪，要他辞去议和代表的职务，造成谈判决裂的形势。同时，袁世凯又指使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余人，发表通电，进行武力恫吓说：“若以少数人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帝国主义也恶意讥评孙中山，并说只有袁世凯才能“统一”。帝国主义还冻结海关收入，不准南京临时政府取用，但对袁世凯却给予借款。美国公使说：“在此紧急关头，如不给以财政援助，袁将不能维持他的军队，而谈判终将失败。”

“列强合作借款与袁世凯，亦可对中国南方领袖之气焰予以打击，不致要求过奢，致中国南北双方和谈不能成立。”这就清楚地招供出，帝国主义反对南京临时政府和援助袁世凯的反革命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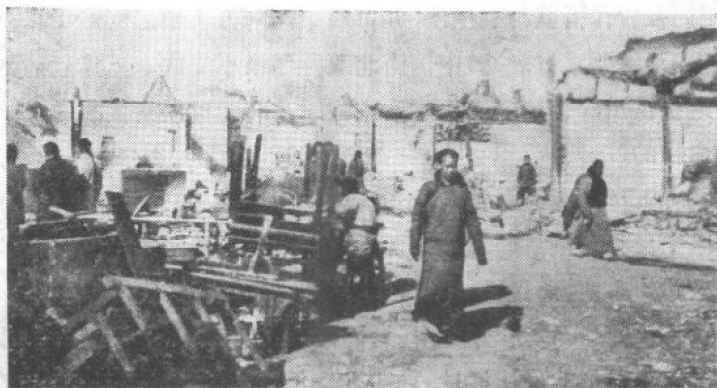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能也不敢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威胁进行斗争，因而在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威胁的面前，使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孙中山向袁世凯表示，只要得到清帝退位的确切消息，袁世凯公开宣布赞成共和，就立即辞职，向参议院举袁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得到了孙中山的保证，于是，他一面称病，由心腹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威逼实际上已被革命冲倒的清朝皇帝退位；一面策动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四十多人，就是原来“誓死反对共和”的将领，又发出通电，要求清帝退位，“立采共和政体”。到这时，清朝皇室谁也不敢再说个不字了。

二月十二日，清朝皇帝溥仪下诏宣告退位。十三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俨然以共和制的保卫者自居。这个电报，实际上是袁世凯索取民国总统的通牒。十四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继任，黎元洪任副总统。

孙中山辞职时，坚持建都南京，意图使袁世凯离开北方老巢。袁世凯为此又施展阴谋，进行破坏。二月下旬，南京方面派专使团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袁表面上热烈欢迎，暗地



袁世凯指使发动“兵变”后的情景——之一

里却指使北洋军第三镇统制曹锟发动“兵变”，二月二十九日夜在北京大肆放火抢劫，并故意抢到专使团的住所。接着，保定、天津、通州，也发生同样的“兵变”事件。三月初，北京外交团借口“兵变”，决议调军队进入北京“保护”使馆，日本首先调山海关及东北南部驻军一千余人，向北京进发。一时北方形势十分紧张，制造出一个袁世凯不能离开北京的局势。袁世凯又指使段祺瑞、冯国璋等，乘机叫嚷：“临时政府必应设在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只好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毛主席在论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时指出：“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



袁世凯指使发动“兵变”后的情景——之二

**专政。”**<sup>①</sup> 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但是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夺而去。袁世凯取代清朝政府，建立了地主、军阀、官僚的专政，从而也保持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

<sup>①</sup>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四页。

### 三、专制独裁的军阀统治

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的初期，南方还有七、八省地盘和十几万军队，仍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手中，帝国主义对此深感不安，公开表示：“承认民国的恰当时机，还未到来。”它们一方面以此威胁南方革命党人交出地盘和军队，另一方面又促使袁世凯加紧实现“统一”。帝国主义为了帮助袁世凯实现“统一”，源源不断地对袁世凯政府贷款。据不完整的统计，从一九一二年一月到一九一三年六月，贷款达三十二次之多，平均每月给两笔贷款。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颁布“训勉军人令”，提出“服从统一命令”。接着，他大叫军队太多，人民负担不起，想借此削弱南方的军队，扩充和壮大自己的反动武装。袁世凯利用外国贷款购买大量军械，把北洋军加以扩充，如段芝贵编练拱卫军二十营，倪嗣冲编练新军二十营。这就揭穿了袁世凯大叫军队太多的真正目的。四月二十九日，袁世凯出席参议院发表演说，提出“整饬纪纲，修明法度”，要人们服从他的“纪纲”“法度”，以取消辛亥革命时人民取得的若干自由权利。他强调“回复秩序”是取得帝国主义“承认”的条件，

说：“民国成立，迄今半年，外之列强承认，尚无端倪，内之各省秩序，亦未回复，危机一发，稍纵即逝。”接着，杀气腾腾地表示：“若乃不逞之徒，竟有破坏，借端荧（音营 yíng）惑，不顾大局，则世凯亦惟有以国民之公意，与天下共弃之。”他以“回复秩序”、惩办“不逞之徒”为名，大肆屠杀革命党人。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三年，参加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被袁世凯和黎元洪杀害的，就有两千多人。湖北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一九一二年八月在北京被袁世凯、黎元洪以“蛊（音古 gǔ）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的罪名杀害，就是一个“中外震惊”的谋杀事件。

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后，资产阶级革命党的一些领导人，还企图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进行议会斗争，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一九一二年三月，孙中山公布《临时约法》。在《临时政府的组织大纲》中，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以限制总统的权力。但在实际行动上，他们却继续和袁世凯妥协。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宣言要努力实现他的民生主义，在十年内建筑二十万里铁路。一九一二年八月，袁世凯就邀请他到北京会晤，特授他“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孙中山经过这次会晤，决心“尽让政权于袁氏”。

黄兴在临时政府北迁以后，任“南京留守”，统率南方部分军队。但到六月，迫于形势，自请撤销“南京留守府”，解散军队。他到北京和袁世凯会晤时，袁授他“川粤汉铁路督办”衔。他是和袁世凯妥协的代表，甚至劝袁世凯参加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的首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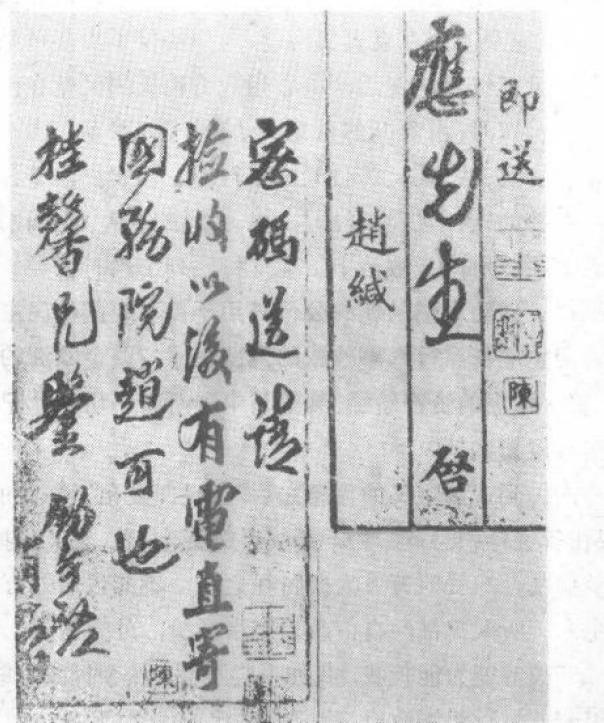
国民党是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当时的几个小党派组成的。负责国民党实际工作的宋教仁，是一个资产阶级议会迷。他在一九一二年底到一九一三年初大肆活动，进行国会竞选。选举的结果，国民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中获得压倒多数。这时，宋教仁满以为可以组织内阁，出任内阁总理了。于是四出游说，一面主张选袁世凯为正式总统，一面鼓吹国会应通过由多数党组织责任内阁，企图分袁世凯的权力。

袁世凯是一个寸权必夺的反革命反人民的野心家，他要实行军事独裁，对宋教仁的活动，当然不能容忍。在国会召开的前夜，袁世凯决定收拾他。一九一三年三月，当宋教仁由上海搭车北上时，就突然在上海车站被刺杀了。

袁世凯得到宋教仁被刺消息的时候，大耍贼喊捉贼的伎俩，装出非常惊异的神色说：“有此事乎？”“拿电报来！”看了电报之后，又假装叹息说：“确矣！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了宋遯（音盾 dùn）初（宋教仁字遯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办事。”他立即电令江苏都督和民政长，彻底追查主使行刺的人，要“查清”情况，依法“严办”。事隔两天，捕获了凶手武士英和指使者、袁世凯的“长江侦探科长”应夔（音葵 kuí）丞（又名应桂馨 音兴 xīng），并从应家搜获手枪、密电、信件等。查清情况的结果，主使行刺的不是别人，正是袁世凯；直接布置暗杀的，是袁世凯的特务头子、内阁总理赵秉钧和国务秘书洪述祖。在行刺前，应夔丞给洪述祖密电说：“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梁山匪魁”，指的是宋教仁。刺杀后，洪述祖密电赵秉钧说：“梁山贼寇

已伏诛，转达极峰”。“极峰”是指袁世凯。当时有一《挽宋教仁联》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

袁世凯刺死宋教仁，激起了人们的愤慨。湖北许多革命党人，得知宋教仁被刺的消息后，立即组成“改进团”，以“继续革命事业”为宗旨，积极策划武装起义。



赵秉钧给应夔丞(桂馨)的密信



“宋案”发生后，人们开始看清袁世凯的面目。三月底，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认为“非去袁不可”，主张立即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举起反袁的旗帜。但是，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黄兴对武力讨袁没有信心，主张“依法解决”。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想保住自己一官半职，一味强调应该通过国会，凭借法律倒袁。还有些人以汪精卫为代表，投合袁世凯反革命两面政策的需要，在南北之间进行“调停”活动。国民党内部的严重分裂，完全暴露在袁世凯面前，为他提供了更多可乘之机。

袁世凯继谋杀案后，决心用武力消灭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实力。四月，由参谋部下秘密动员令，要张勋和山东部队候令待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同袁世凯签订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竭力给予支持。美国则带头承认袁世凯政府，从政治上给他支持。列宁当时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借给中国的新的公债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中世纪反动势力实行联盟的”。<sup>①</sup>

在得到帝国主义的撑腰之后，袁世凯发出了强硬的声明：“现在看透孙(文)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

<sup>①</sup>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八三页。

本来袁世凯是受讨伐的，现在他却先发制人。袁军南下四布，发动内战。他借口国民党的江西都督、广东都督、安徽都督曾通电反对借款，不服从中央，下令撤职。把孙中山叫做“乱党孙文”，把黄兴也列为“逆首”，罪名都是“破坏民国之统一”。

七月，江西国民党人在湖口发出讨袁通电，自称“讨逆军”。接着，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先后宣布脱离袁世凯政府而独立，但因各怀猜疑，不能一致行动。又由于国民党内部分裂，人民已对它冷淡，不到两个月时间，就被袁世凯的军队打败，南方八省尽入北洋军阀统治之下。

事后，孙中山逃到日本，曾写信给黄兴说：二次革命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因党人涣散所致”。

袁世凯在打败讨袁军之后，认为由临时大总统变为正式大总统的时机已到。他要以民国总统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一九一三年五月，袁世凯为了对付国民党，命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为进步党。进步党党魁梁启超承认，进步党是靠袁世凯经费活动的，是帮助袁“挟国会以号召天下”，“戡（音刊 kān）乱图治”的。他们极力主张建立以袁世凯为中心的“强有力之政府”，“实行唯一最高政府之集权”。进步党人是直接由清末的立宪党人演变而来的。他们拥护袁世凯，梦想制订宪法，走上“宪政轨道”，从而能得到一官半职。而袁世凯的策略，则是先组织好进步党，对抗国民党，以便于把国民党打倒；而后转过来，再把进步党搞掉。一九一三年九月，袁世凯让进步党熊希龄组阁，梁启超、张謇等均为阁员。进步党对袁世凯十分

忠心，但在袁世凯看来，它毕竟只是与党，仍旧怕它靠不住，要提防它的活动越轨。袁世凯在进步党组成内阁后一个星期，便命亲信梁士诒高价收买一批议员，在国会中成立所谓“公民党”，作为他在国会的打手。这个公民党的“第一步政策，则在选举袁氏为正式总统”。本来照国会选举法与组织法规定，须先制宪法，后举总统。可是袁世凯已迫不及待，示意全国十九个省区的“军政长官”，联名发表通电，要先举总统，后制宪法。公民党在国会也大肆进行活动。十月六日选举这天，袁世凯派出便衣军警、兵痞、流氓几千人，号称“公民团”，整整齐齐如军队一样，把国会包围得水泄不通，高叫：“今天不选出公民中意的总统，选举人不能出场一步！”国会连续投票三次，最后才选出袁世凯为大总统。袁世凯如愿以偿，“公民团”才整队而去。

国会“选举”袁世凯做总统后，在袁世凯看来，它已是碍手碍脚的废物了，决心抛弃这个废物。于是，他借口国民党议员与江西湖口“讨逆军”有往来密件，下命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的资格，追缴他们的议员证书和徽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开不了会。这一道命令是由进步党内阁总理熊希龄副署发布的。过些日子，那些主张要国会先选举总统、后制订宪法的所谓各省“军政长官”，迎合袁世凯的意旨，又请袁世凯撤销其余议员的资格。一九一四年一月，袁世凯正式宣布解散国会。这离开“选举”总统的时间，仅仅两个月；离开召开国会的时间，也只有九个月。内阁总理熊希龄副署了这一切命令之后，袁世凯回转头来，又把进步党内阁搞掉，进步党人也被

袁世凯一脚踢开。

在就任正式总统后一个星期，袁世凯要求修改《临时约法》。他说，他过去一人一身受约法束缚，就是四万万同胞生命财产受约法束缚。命令他的御用机关“中央政治会议”，制订一个“约法会议组织条例”，开约法会议，修改约法。这个机构只用了一个多月功夫，就赶造出一部“约法”，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公布。这部袁记约法规定的总统权力，和专制皇帝的一样。同时，袁世凯又设立一个专门机关——参政院，以代行立法院职权。参政院制订了一个“总统选举法”，规定：一、总统任期十年，连任无限制；二、现任总统认为“政治上有必要”得连任，无须改选；三、总统继任人应由现任总统推荐，名字写在称作“嘉禾金简”的纸上，藏于密室，选举时才取出。根据这个规定，袁世凯不但可以终身做总统，还可以由他的子孙后代继任。据记载，袁世凯将他长子袁克定作为总统继承人，名字藏在中南海居仁堂右特设的密室内。

## 四、洪宪帝制丑剧

辛亥革命后，虽然成立了一个徒具形式的“民国”，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丝毫没有改变；清朝皇帝虽然被赶跑了，可是仍然存在产生皇帝的社会基础。当时，社会上反动、顽固的封建势力，对封建王朝充满依恋之情，而刻骨地仇恨共和制度。鲁迅说得好，辛亥革命时，“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但到辛亥革命之后，“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然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党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

大地主世袭财产的要求，希望由皇帝的世袭秩序重新表现并重新巩固起来。由中外反动势力扶植起来的大野心家、大独裁者袁世凯，当上具有专制帝王权力的总统，还嫌不够，还想当皇帝。他站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立场上，要求建立传子传孙、“万世一统”的世袭统治。

袁世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要做皇帝，必然要得到主子的支持。袁世凯最先叫袁克定到德国，取得德皇威廉二世对恢复帝制的支持。德皇曾有一封密信给袁世凯，答应“财政器械

给以大力援助”。英国知道了德国赞成帝制，急忙由驻华公使朱尔典面见袁世凯，说辛亥革命时，他与美使嘉乐恒以及前美使柔克义，也曾经主张君主立宪，但“南北讨论之时，唐绍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也”。透露了英国早已为帝制煽风点火。美国的报纸，也在这个时候鼓吹“中国宜于实行君主制”的谬论。袁世凯曾派人专程去美国活动，得到美帝国主义的支持。美国驻华公使芮（音锐 rui）恩施，对袁世凯称帝进行怂恿和鼓励，他给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帝制运动已有长足发展”，“亟（音吉 jí）盼它能在短期内顺利完成”。

一九一四年八月，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爆发了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要趁大战的机会，在政治上、财政上完全控制中国，使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派兵在山东登陆，强占胶济铁路和青岛。日本知道袁世凯想要做皇帝，必须取得它的援助，这就为它侵略中国提供了条件。日本首相大隈（音威 wēi）重信，叫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暗示，“中国应该有皇帝”；大隈自己又向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表示，“改共和为帝制是中国内政问题，袁大总统可以放心进行”。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又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袁承认。当日置益手递条文的时候，曾对袁世凯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大总统再高升一步”，就是赞成袁世凯做皇帝。袁笑纳条约，低首而退。

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共分五号：

一、要求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增加新的权利；

二、要求在南满和东蒙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

三、合办汉冶萍公司；

四、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予第三国；

五、攫取统治中国的政治、财政、警察、军事大权，以及湖北、江西和广东之间的重要铁路建筑权。

日本的企图是要独占中国，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经过几个月秘密交易，除第五号“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各条被袁世凯全部接受，于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正式承认。同时又达成一项默契，规定袁世凯称帝，日本赞成。卖国贼袁世凯就是这样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

袁世凯得到帝国主义的认可后，就加紧进行恢复帝制的活动。他废除内阁总理制的国务院，在总统府下设立“政事堂”，以“国务卿”为首脑，下设“左丞”“右丞”。他的心腹徐世昌为国务卿，当时人称“徐相国”。同时，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袁世凯的亲信称它为“军机处”。袁世凯为了使袁克定继承大业，还专设“御林军”——模范团，自任团长，袁克定任副团长，军官都是与袁克定有关系的人，班长从保定军官学校选拔身材高大的毕业生充当。模范团成员要宣誓效忠袁氏父子：“服从命令”，“不惜牺牲性命”。这个模范团，是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打手。随后，袁世凯把各省都督改名“将军”，民政长改名“巡按使”；还把文官分为上卿、中卿、少卿等九等，恢复了封建帝制时代的官名和官阶。他要做皇帝的野心，已完全暴露。

袁世凯为称帝大造反革命舆论，抬出孔子这具僵尸，命令全国恢复祀孔典礼，宣扬“孔孟之道”。鲁迅指出：“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袁世凯就是把孔子当作称帝的“敲门砖”使用，为复辟制造舆论。美、日帝国主义分子也极力替袁世凯鼓吹复辟帝制的言论，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了一篇叫做《共和与君主》的文章，诬蔑中国人民知识太低，由专制变为共和太急，从而提出中国实行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的谬论。袁世凯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写了《共和宪法持久策》一书，诬蔑中国人不适于共和政体，必须集权于袁世凯一身，国家才不会分裂，宣传要袁世凯做皇帝的谬论。袁世凯的爪牙也紧紧跟上，鼓吹帝制。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有几个清末立宪党人和同盟会叛徒，组成



袁世凯箝制言论，查封报社



“筹安会”，冒充学术团体，公开策划复辟的活动。他们从袁世凯那里领取经费，进一步替袁世凯称帝做舆论准备。

袁世凯一面积极地进行恢复帝制的准备，一面又假惺惺地“辟谣”，继续使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正当这时候，冯国璋到北京，问他：“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袁世凯立即赌咒发誓，表示不愿做皇帝，说“我绝对无皇帝思想”，“如果有人强迫我做皇帝，我就要逃到英国去，从此不再过问国事。”

“蜉蝣（音孚游 fúyóu）托命原朝暮，魑魅（音痴妹 chīmèi）穷形杂异同。”袁世凯的称帝，象蜉蝣一样，也只能是短命的。从一九一五年九月起，袁世凯进一步盗用“民意”，把自己推为皇帝。他授意：“变更国体”，要取决于“国民之公意”。在他指使下，刹时间，全国出现许许多多“请愿团”，什么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真是“魑魅穷形”，无奇不有。这就是袁世凯的“民意”。买办官僚梁士诒出面为袁世凯策划，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成为鼓吹帝制的领导者。十月，在袁世凯的统一指挥下，各省选出“国民代表”，三天后开始“国体”投票。全国共有票数一千九百九十三张，赞成君主制度的竟然也是一千九百九十三票！各省还都写有同样文字的“推戴书”：“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制造了种种“民意”后，无耻地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经过一番丑恶的表演，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凯做了“中华帝国”的皇帝。他说：他所以做皇帝，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为了“爱国”！接着，他在居仁堂受文武百官朝贺，封黎元洪等一百

二十八人爵位，成立了“帝制大典筹备处”。他下令从一九一六年起改为“洪宪元年”，并要在元旦那天举行“登极”大典。

毛主席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sup>①</sup>

袁世凯卖国和恢复帝制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许多省份先后爆发了反抗斗争。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五年，山东、山西、河南、奉天等省农民，进行反对验契、清丈和增加捐税的斗争。一九一二年，河南发生的白朗起事，先后达四年之久，扩展到湖北、陕西、甘肃等省，提出“劫富救贫”、“建立完美之政府”的口号。直到一九一五年袁世凯调动二十万军队，才镇压下去。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人民立即掀起大规模的爱国运动。上海码头工人首先举行罢工，散发传单，反对日本侵略和袁世凯卖国，并决议一致抵制日货；上海日货企业的中国工人，几乎全部参加了斗争。湖南长沙各日货企业的罢工工人，也开展抵制日货的宣传工作。广大爱国青年学生纷纷组织救亡团体，进行反抗斗争。反对“二十一条”的正义斗争，迅速遍及全国，各阶层人民都积极投入运动，给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以沉重打击，使得“二十一条”从一开始就未能生效。袁世凯称帝，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怒潮。全国各地纷纷致电，进行声讨，指出袁世凯称帝，“叛逆罪恶，已不容诛”。提出要诛筹安会诸人，“以为妖言乱邦者戒”。要求立斩梁士诒等人的头，“悬之国门，以谢天下”，表现了广大人民对袁世凯称帝的无比义愤。

<sup>①</sup>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九六页。

正当袁世凯盼望“登极”大典到来的时候，云南的反袁势力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布云南独立，接着贵州、广西等省响应，组成“护国军”，进行讨袁战争。

云南独立，是云南军队的中下层军官，经过长期酝酿，在蔡锷(音扼 è)秘密回到云南后爆发的。蔡锷在辛亥革命时期，曾任云南都督，后被袁世凯诱骗到北京软禁。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以梁启超为领袖的进步党，本是拥袁的。当袁世凯称帝、全国酝酿反袁斗争的时候，梁启超等进步党人，看到袁的败亡已不可免，于是就抢先一步发动倒袁，以便取得领导地位，有利于将来夺取政权。梁启超说，要“当此普天同愤之时”，自求“树立”起来。梁启超和蔡锷经过密商，由蔡锷回云南，发动讨袁。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于一九一六年一月率军进入四川，很快占领了江安、纳溪一带，与袁世凯派遣的曹錕所部北洋军，交战于川南。

日本等帝国主义虽然曾经表示赞成帝制，但是当他们感到袁世凯政府并不巩固的时候，又密谋扶植反袁势力，企图乘机取利。云南独立后，各国公使纷纷提出质问，袁世凯拍着胸脯保证：“滇(音颠 diān)事仅少数人主持，该省兵力有限，六个月内当可敕(音米 mì)平。”但是，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护国军声势日益扩大。贵州、广西独立后，组织贵州护国军和两广护国军，事态愈益扩大。日本政府决定拒绝袁世凯派出的赴日专使，表示不承认袁世凯称帝。“太上皇”的态度起了变化，二月间袁世凯只好下令缓办帝制，撤销大典筹备处。

在这形势下，北洋军阀内部也开始分化。袁世凯手下的

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对袁世凯称帝抱消极态度。他们原来都是以袁世凯总统继任人自居的，希望有朝一日继任总统的位置。袁世凯称帝，使他们大失所望，因此不愿意替袁世凯称帝卖力。袁世凯对他们也产生疑忌，处处提防他们夺权。袁世凯设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大大削弱了段祺瑞所管陆军部的权限，在帝制活动中又找借口免了段祺瑞的职，因此段祺瑞在一旁冷眼相看。袁世凯对冯国璋任江苏都督，坐镇南京，也不放心。冯国璋的新夫人周道如，就是袁派去替自己作特务的。冯国璋据有长江下游，实力不小，袁世凯称帝，冯认为受骗了，于是也不再唯袁之命是从，暗中与护国军联系，并与江西将军李纯等，联名要求取消帝制。

这样，袁世凯无可奈何地在一九一六年三月宣布取消帝制，由徐世昌任国务卿，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从袁世凯称帝到取消帝制，前后不过八十三天。

袁世凯撤销帝制后，废除了洪宪年号，仍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可是，护国军不罢休，坚持要袁世凯下台。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孙中山逃亡到日本后，于一九一四年六月成立的反袁秘密组织)，这时也积极发动反袁斗争，在山东、江苏、湖南等地策动武装反袁。一九一六年六月，湖南武冈农民群众，揭竿而起，猛攻县署，打破监狱，释放囚犯。与此同时，湖南新化锡矿工人举行罢工，部分工人驰至山左长龙界，夺取新华昌公司矿警连的枪枝，宣布工厂独立，悬挂护国军旗帜。全国各地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反对袁世凯继续称总统，要求对他进行惩办。原同盟会会员井勿幕等，以十九省“公民”的

名义发表宣言，反对袁世凯再称总统，说：“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希望全国人民再接再厉、共同“捕杀此獠（音辽 liáo）”。江苏发出的通电说：袁贼“已构成谋叛之罪，丧失总统资格”，要他“静待国民组织特别法庭，听受裁判”。浙江发出的通电指出：“袁贼托辞救国，重诬吾民，背叛共和，谋窃帝制”，要求全国“一致倒袁”。海外华侨也纷纷发出通电，要求审判袁世凯。

在袁世凯狼狈不堪、焦头烂额的时候，冯国璋接连打电报给他，要他退位，并联合张勋、倪嗣冲，共同发起召开十五省代表参加的南京会议，讨论袁世凯的去留问题。袁世凯在南方一些省区的爪牙，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也相继宣布独立。这时，袁世凯又解除徐世昌国务卿的职务，起用握有实力的段祺瑞为国务卿，并在五月初恢复责任内阁制。企图以此缓和局势，稳定北洋军阀内部。可是，局势的发展，已非袁世凯所能控制。五月底，袁世凯的忠实走狗四川将军陈宦（音夷 yí）和湖南将军汤芑（音乡 xiāng）铭，也通电宣布独立。至此，袁世凯彻底孤立，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记载说：“其时也，袁之声色均废，于电文译呈之后，汗流浹（音佳 jiā）背，目眩头晕。”从此病倒在床，再也起不来了。

毛主席指出：“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sup>①</sup>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这个篡权窃国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卖国贼、北洋军阀头子，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唾骂声中，在仓惶、恐惧、狼狈的情景下，结束了丑恶的一生。

<sup>①</sup>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九五页。

## 五、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

袁世凯垮台后，帝国主义失去了共同的走狗，都各自寻找和扶植一部分军阀，充当自己的代理人；北洋军阀失去了袁世凯这个总头子，也各成派系，分别投靠各个帝国主义。参加反袁的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等省的军事头目，拥兵自固，向邻省扩张，成为地方军阀。中国出现了军阀分裂、割据的局面。

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在袁世凯垮台前，就已形成两个派系的潜在势力。段祺瑞历任袁世凯政府的陆军总长、内阁总理等职，握重兵，掌实权，搜罗了一批亲信。冯国璋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七年担任江苏都督，在长江流域扩充势力；袁世凯称帝后，他召开南京会议，另树一帜，从而抬高了自己的地位。

北洋军阀中段祺瑞和冯国璋的分裂，在袁世凯死后就表面化了。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以他为头子的军阀集团，被称为“皖系”；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以冯国璋为头子（冯死后以曹錕、吴佩孚为头子）的军阀集团，被称为“直系”。皖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掌握安徽、山东、浙江、福建等省地盘，一再利

用北京中央政权排斥异己，扩张自己的势力。直系军阀主要控制江苏、江西、湖北、直隶等省地盘，占有长江流域和北方重要地区，经常联合反皖系势力，与皖系军阀相对抗。

稍后，以张作霖(音林 lín) 为头子的奉系军阀，也发展成为一大派系。张作霖，奉天(今辽宁)海城人，原是一个马贼(土匪)，一九〇三年被清朝政府招抚。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期间，他在东北先后充当沙俄和日本的间谍。后来又投靠袁世凯的党羽张锡奎(音鸾 luán)，任郑家屯巡防营管带。辛亥革命以后，张锡奎、段芝贵相继担任奉天都督，将张作霖的部队改为新军编制。一九一五年护国战争后，张作霖乘机驱逐段芝贵，充任奉天都督，夺得奉天省地盘。接着，张作霖采取安置亲信等手段，逐渐将吉林、黑龙江扩充为自己的地盘。这样，东北三省被奉系军阀所割据。

还有以阎锡山为头子的山西军阀集团。阎锡山在辛亥革命期间，窃据了山西都督职位，后来又投靠袁世凯，扩充军队。袁世凯称帝时，阎锡山上书劝袁世凯做皇帝。袁世凯死后，阎锡山又依附段祺瑞，继续盘踞山西省。

还有一类较小的军阀，如割据徐州一带的张勋等。

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军阀中，最大的是以唐继尧为头子的滇系军阀，和以陆荣廷为头子的桂系军阀。滇系军阀占有云南、贵州两省，乘护国战争的时机，向四川扩张地盘，与四川军阀进行争夺。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支持四川军阀刘存厚，与滇系军阀进行混战。桂系军阀在护国战争中出兵广东，驱逐龙济光到海南岛，占据两广地盘。四川军阀把

全省分为几个“防区”，各自占据几县或十几县。南方军阀为了维护自己的割据地位，常常联合起来，和控制北京中央政权的皖系军阀相对峙。

当时，全国除南方六省外，几乎都直接处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之下。他们有的割据一省称“督军”，或者割据一省中的某一地区称“镇守使”，实行封建军事割据。

军阀分裂、割据局面的出现，是封建的地方农业经济的分散性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的产物。

当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很微弱，还是一个半封建的农业国。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若干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以至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大约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是落后的、分散的、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经济。在地方农业经济基础上，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分散的地方农业经济和很深的地方主义，使军阀得以进行封建军事割据。

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受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支配，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采取分裂剥削的政策。长江



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英、美帝国主义就扶植直系军阀，使直系军阀成为它们的走狗。南方军阀与直系军阀接近，也充当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忙于大战，在一个时期内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最大，日本帝国主义就扶植控制北京中央政权的皖系军阀，使皖系军阀充当日本统治中国的工具。东北南部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帝国主义就扶植奉系军阀充当它的走狗。其他军阀也都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如山西军阀阎锡山，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盘据徐州一带的军阀张勋，则勾结德、日帝国主义特别是德国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供给大小军阀以军费、军火和军事顾问，扩张侵略势力。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七年，军阀政府共借外债四百六十七项，借款总额达十三亿美元以上，用来支付军费开支的，占百分之五十四以上。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四年，美国对直系军阀运送的军火，价值达三百二十八万美元，步枪一万枝、子弹二百万发、机关枪二百五十挺，还由美国人博治亚在洛阳替吴佩孚设飞行机械厂。帝国主义还派遣了许多帝国主义分子充当军阀的“顾问”，段祺瑞政府里有日本的青木为军事顾问，有贺为政治顾问，坂谷为财政顾问。这些顾问，都是帝国主义政策的执行者，也是军阀的“太上皇”。如段祺瑞的日本军事顾问，其聘用条件有云：“凡中国一切陆军行政，非经该顾问批准，不能施行”；又云：“中国军务经该顾问认为不合者，得依其意见更改之”。这样，段祺瑞的军权，实际上掌握在日本军事顾问的手中。

毛主席指出：“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sup>①</sup>各派军阀在各自的帝国主义主子支持下，纷争不已。军阀的纷争，最先在中国要不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爆发出来。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袁世凯集中的军阀权力，变成分散的军阀权力。各省的将军改为督军。北京中央政权，操纵在以段祺瑞为头子的皖系军阀手中。英、美帝国主义则扶植黎元洪和冯国璋，与日本扶植的段祺瑞相对抗。

一九一七年二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帝国主义宣布将以潜艇封锁海面，使美国受到威胁。美国帝国主义随即与德国绝交，要求中国与它采取一致行动。三月，中国国会通过对德绝交。日本和美国都想操纵中国的参战，以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日本派人与段祺瑞等秘密接洽。段祺瑞企图借参战名义，得到日本的借款，以扩大皖系势力，因此积极主张参战。美国看到日本积极活动，又示意中国不要对德参战。冯国璋于是通电反对参战，其他直系军阀和附属于它的势力，也跟着通电反对参战。段祺瑞要黎元洪在对德宣战的电稿上签字盖印，遭到黎元洪拒绝。黎元洪的总统府与段祺瑞的国务院之间，发生了所谓“府院之争”。四月，段祺瑞在北京召集各省督军开会，将参战计谋告诉皖系督军，组成以皖系军阀为骨干的“督军团”，胁迫国会和黎元洪同意参战。黎元洪则利用国会

<sup>①</sup>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四七页。

反段，闹得不可开交。

五月，众议院讨论宣战案，段祺瑞效法袁世凯的故技，指使军警二、三千人，组成所谓“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等，包围众议院，殴辱议员，威胁他们立即通过参战案。段祺瑞这一横暴行为，激起了议员的反对，内阁中的非皖系阁员，相率辞职。众议院决定暂不讨论宣战案，要等新内阁成立后再议。段祺瑞恼羞成怒，唆使督军团呈请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在英、美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下，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

段祺瑞决心继续把持北京中央政权，唆使督军团反对黎元洪。皖系与奉系督军，都通电宣布独立，剑拔弩（音努 nǔ）张，准备进军北京。六月初，段祺瑞企图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没有成功，改设“独立各省总参谋处”，与北京黎元洪相对抗。黎元洪只得求救于自成一派的军阀张勋，要张勋带兵来北京“调停”。张勋乘机演了一幕复辟的丑剧。

## 六、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就是要使已被推翻的清朝皇帝溥仪重新上台，恢复清朝封建帝制。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人民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清朝皇室根据袁世凯的优待条件，在故宫里还保存着一个小朝廷。这个小朝廷继续保持清皇朝的体制，还有一支侍卫军，每年享用四百万元巨款的优待费。被推翻的皇帝溥仪，经常坐在皇帝的宝座上，接见袁世凯和黎元洪等派去朝拜的军阀、官僚。这个小朝廷内外聚集着一批复辟分子，成了帝制复辟集团的政治中心。

封建帝制复辟集团，是文的与武的、台上与台下相结合的。它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

一、以张勋、升允为代表的武装复辟势力。张勋在辛亥革命前夜升任江南提督。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盘踞在南京反抗革命，被江浙起义联军所打败，退往江北。但他仍时刻不忘清朝皇帝，他所统率的定武军仍留着辫子，以示拥护清朝。人们称张勋的军队为“辫子军”，张勋为“辫帅”。这个“辫帅”，在袁世凯的庇护下，历任江苏都督、长江巡阅使等职。他乘一九一三年到南京镇压“二次革命”的机会，夺得一批枪炮，并向德

国洋行陆续购买大批军火，将“辫子军”扩充达两万多人，盘踞在徐州一带。袁世凯死后，他自成一个派系，受到各种复辟势力的重视，俨然成为封建帝制复辟集团的中心人物和首领。

升允在清朝末年曾任陕甘总督，辛亥革命爆发后率领过一支反革命武装，向陕西起义军疯狂反扑，挣扎了五个多月。失败后逃到东北，又勾结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组织一支满蒙王公的反动武装，从事复辟活动。辛亥革命后，东北封建王公贵族的武装叛乱、安东一带的暴动、热河兵变、反动会道门的蠢蠢欲动，都与升允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二、以溥伟、善耆（音译 qí）为代表的清室王公贵族复辟势力。溥伟、善耆是清室的亲王，皇族中的死硬派。他们在辛亥革命中竭力反对共和，反对清朝皇帝退位。辛亥革命后，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下，逃离北京，分住青岛和大连。他们的住所很快成了复辟分子聚集的巢穴。他们主要是依靠一部分满蒙贵族王公，在东北一带从事复辟活动。

三、以劳乃宣为代表的清朝“遗老”复辟势力。这是张勋复辟集团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这批“遗老”，包括曾经在清朝政府中担任过中央和地方要职的人物。他们除官僚身份外，还有封建文人身份，是复辟集团中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家伙。

另外，由改良派堕落为保皇党的康有为，辛亥革命后更加反动，成为张勋复辟集团中的一员主将。复辟分子把康有为和张勋并列，分别称为“文圣”“武圣”。

张勋复辟，也把孔子当作“敲门砖”使用。复辟派中的封建文人，正是中国半封建文化中最反动、最顽固的分子，他们

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为复辟封建帝制进行宣传鼓动。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四年，他们在山东曲阜两次举行祭祀孔子的典礼。一九一三年春，江苏扬州“尊孔崇道会”在孔庙举行祭祀。一九一五年，江苏青浦所举行的“祝圣礼”，规模很大，仅礼成后参加写诗、和诗者，即达“千数百人”之多。这些都在社会上造成恶劣的影响，为复辟制造舆论。复辟分子很重视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攻击革命的文章。劳乃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立即在《民是报》上发表《共和正解》一文，公然反对辛亥革命的民主思潮。一九一四年袁世凯称帝野心暴露于世的时候，劳乃宣又作《续共和正解》《君主民主平议》两文，把北洋军阀统治的恶果，归咎于民主共和制度，公开叫嚣非恢复帝制不可。康有为举办《不忍》杂志，宣传“孔教”，鼓吹复辟，曾先后发表《共和救国论》《共和政体论》和《救亡论》等文章。公然宣称他在戊戌变法期间的言论，是“不了解国家情况的大谬论”，主张几千年的中国帝制不能改变，替清朝统治歌功颂德。正如鲁迅所说：“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复辟分子还写了大量家谱、墓志铭，借此宣扬封建道德和“忠君孝亲”思想。此外，劳乃宣在青岛设立“尊孔文社”，专讲孔孟之道，吸收清室贵族和遗老子弟参加，培养“遗少”。这一切都是为张勋复辟做舆论准备。

封建帝制复辟集团，进行集党、结社，为复辟积蓄力量。辛亥革命时，清朝“遗老”复辟势力，大多避居“租界”，或者隐居乡里，借以逃脱革命的直接冲击，并表明反革命的“气节”。但是，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他们又逐渐从各个阴暗角落钻了出

来，互通声气，展开各种组织活动。一九一二年六月，寓居上海的清朝“遗老”，在愚园召集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聚会，许多“遗老”从各地纷纷赶到上海参加。一九一四年三月，“避地青岛”的“遗老”，还召集了一次“十老会”，到会人大多是曾任清朝尚书、总督之类的高级官员，年龄在七十岁以上，他们互相激励垂死挣扎的勇气。除了酒会外，还有诗社。一九一二年最早成立的“超社”，成员每月聚集一次。他们的诗词都很反动，是一些诅咒革命、幻想清皇朝复辟的反革命叫嚣。此外，复辟分子还通过结儿女亲家的方式，团聚力量，利用封建的婚姻关系“固结党势”。劳乃宣与许多“遗老”之间，都有亲上加亲的关系，从而使复辟集团联结得更为紧密。

张勋复辟，得到德、日帝国主义特别是德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一九一二年秋天，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亲王，来中国“访问”，在青岛逗留很久，与溥伟等人往来频繁。亨利曾当面向溥伟表示，“他的皇兄陛下和他本人，将竭力支持清朝的复辟。”第二年，德国文化特务尉礼贤，“协助”住在青岛的“遗老”创设“尊孔文社”，建立“藏书楼”。劳乃宣和他往来，表面上是“讲经”，暗地里在策划复辟。以后，劳乃宣正式向溥仪建议“联德复辟”，劝他向德皇的女儿求婚，并到德国留学，这正是尉礼贤长期策划的阴谋。

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七年，德国为了抵制协约国美国和日本，拉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维护它在山东掠夺到的既得利益，更加强了对张勋复辟的支持。张勋在正式复辟前夕，曾与德国侵略分子司格礼达成协议：德国“承认帝国（指复

辟后的清皇朝)新政府成立后,首宜开复中、德国交”。这个草约由司格礼送交德国领事,转德国政府予以承认。外国记者报道,张勋复辟时所用军火,“多为德国所制,‘辫子军’的伤兵送往德国医院治疗,而失败后也是由德国人陪伴引入使馆区逃避”。这说明德国是张勋复辟的主要支持者。

日本也支持张勋复辟集团所进行的复辟活动,以扩大侵略利益。一九一三年,日本支持善耆、升允在东北阴谋叛乱,妄想成立他们所操纵的“独立国”。一九一六年,日本大隈重信政府通过大财阀大仓喜八郎,向善耆、溥伟、升允等提供一百万日元经费,并供应军火,武装满蒙王公反革命军队,在内蒙发动叛乱。同时,日本侵略分子佃信夫等,经常来往于上海、徐州间,帮助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集团,从辛亥革命后一直在策划武装复辟。每逢国内政局动荡,他们就乘机活动。一九一三年,袁世凯派兵镇压“二次革命”,张勋复辟集团就策划武装复辟。一九一六年护国战争爆发,他们又想乘机发动南北配合的武装复辟。这些武装复辟失败后,他们仍不死心,继续酝酿更大的复辟行动。

一九一六年冯国璋召集的南京会议没有结果,袁世凯死后,张勋就邀请到会代表去徐州开会,成立所谓“十三省区联合会”。张勋的复辟阴谋,不仅得到各地军阀代表不同程度的默认,而且取得了“盟主”和“总指挥”的重要地位,从而抬高了身价。段祺瑞当时想利用张勋来打击黎元洪,暗中也支持张勋。一九一七年段祺瑞被黎元洪免去国务总理职务后,更想借张勋的力量,以达到驱逐黎元洪和解散国会的目的。因此,在



黎元洪请求张勋“调停”时，段祺瑞也同意张勋拥兵进入北京。

一九一七年六月，张勋以十三省“盟主”身份，利用“调停”名义，带领五千名“辫子军”北上，通电威胁黎元洪解散国会。随即进入北京，逼令黎元洪去职。张勋进入北京，各派复辟势力随之拥向北京、天津一带，参加复辟活动。康有为在上海早已起草伪诏十数道，这时也匆匆赶到北京。张勋与康有为共同讨论了各项复辟对策，一致同意立即复辟清皇朝。于是，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清帝溥仪复位的丑剧，正式演出。

在短短一个星期内，这个复辟皇朝颁布了一系列伪诏，恢复宣统称号，大肆封官授爵。复辟派的核心人物，都被任命为政务大臣、尚书、侍郎等职，张勋自封为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康有为当上了“弼德院”副院长。

张勋复辟后，整个北京乌烟瘴气。记载说：成群的清朝孤臣孽子涌入北京，“有识者则指于道旁曰：‘此某尚书也，此某侍郎也，某巡抚也，某关道也，某翰林编修也’。”北京估衣铺里的清朝袍褂，成了刚封官的遗老争购的畅销货；在做戏装道具的商店里，遗老纷纷去央求用马尾给他做假发辫，他们的脑后又都拖起了一条辫子。这些穿着袍褂和拖着辫子的清朝“遗老”，在北京街上出现，一个个好象是从棺材里跑出来的。

“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sup>①</sup>张勋的倒行逆施，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全国民情，莫不反对复辟。”七月三日，湖南长沙召开拥护共和、反对复辟的大会，到会者约万余人，会上有人断指血书“护法讨贼”四个字。当天晚上，又有人在

<sup>①</sup>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九六—六九七页。

戏台上发表演说，痛斥清朝政府的统治。上海资产阶级也悬挂五色共和旗三日，以示对复辟的反对。北京一部分报刊，在复辟那天停刊，表示抗议。其他如广东、江西等地人民，还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声讨。

孙中山得知清帝复位的消息，立即在上海会同各方面代表人物决议一致声讨，并派军舰赴秦皇岛接黎元洪到南方，准备组织新政府，与北京复辟皇朝相对抗。

由进步党改称研究系的首领梁启超等，观察到整个形势的变化，断定复辟不能成功，因此决定反对复辟，依附皖系军阀段祺瑞，以求政治上的发展。

日本帝国主义对复辟集团竭力与德国勾结，产生了疑忌，于是采取要段祺瑞转过身来反对张勋，从而操纵北京政权的政策。日本给段祺瑞一百万日元军费，买办官僚梁士诒向天津交通银行拨款二百万元支持段祺瑞，研究系首领梁启超等也为段祺瑞出谋献策。段祺瑞统率驻马厂的第八师军队，分三路进军北京。张勋彻底战败，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其他复辟分子也纷纷作鸟兽散，逃出北京。张勋复辟仅十一天，就被扑灭。

张勋复辟的历史说明，凡是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只要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他们总是千方百计企图恢复失去的“天堂”，并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但是，他们的复辟，总是不能长久的，只能是短命的。因为世界是进步的，任何反动势力决不可能改变这个历史前进的总趋势。

## 七、军阀的激烈争夺

一九一七年七月，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打垮张勋复辟后，恬不知耻地自称是“再造民国”。他继续充任国务总理，组成皖系、交通系、研究系的军阀、买办和官僚的内阁。黎元洪辞职，推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但冯国璋在北京中央政府中的实权，远不及段祺瑞。

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段祺瑞，凭借武力和阴谋手段，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实力。美国因为一九一七年四月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无力在中国问题上与日本竞争，于是暂时采取与日本妥协的政策。十一月，美国国务卿兰辛与日本大使石井订立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日本再次承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事实上，它们之间的妥协只是暂时的，在《兰辛石井协定》签订之后，它们之间的明争暗斗，仍在激烈地进行。

一九一七年八月，段祺瑞政府在日本怂恿下，正式对德、奥宣战。段祺瑞采取的是“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的手段，借“参战”为名，以扩充皖系军阀的实力。当时有人揭露说：“段祺瑞借口出兵欧洲，拟向日本借款购械，用以屠戮异

己。”清楚地道破了段祺瑞政府参战的真正目的。

日本帝国主义对段祺瑞政府采取“菊分根”政策，就好像菊花分根移植一般，把日本资本输入中国，企图变中国为日本垄断资本的殖民地。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以各种名义对段祺瑞政府公开或秘密地提供了大宗借款。日本政府组织了一个银行团，作为对华输出资本的总机构；并于一九一七年设立“中日合办中华汇业银行”，作为借款的经手机关。日本政府派帝国主义分子西原龟三，奔走于北京、东京之间，策划借款事项。段祺瑞政府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三人经办。



西原龟三关于“西原借款”的备忘录(原件照片)

这笔被称为“西原借款”的黑账，至今还未查清。据一个当事人回忆，段祺瑞向日本借款总数达五亿日元，“西原借款”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日本通过借款，不但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侵略权益，而且夺取了东北的铁路、金矿、森林等大量权益。日本还以所谓“无线电台借款”“有线电报借款”和“电话借款”等名目，篡夺了中国的电讯事业；又以所谓“参战借款”“军械军火借款”，控制段祺瑞政府的军事。如一九一七年冬的一次军械借款中，段祺瑞答应日本提出的要求：将“军队所使用枪炮的口径、必要的机要部分及子弹的规格”，均按日本“实行统一”；还答应“将兵工厂及各省煤铁大矿”，归日本控制和垄断，作为借款的抵押。卖国贼段祺瑞只要能借到款，只要军械、军火到手，什么国家民族利益都是可以出卖的。从铁路、轮船、工厂、矿山到各种税收，乃至一个城市、一个商场的收入，都被他拿来作为借款的担保或抵押，简直到了“当尽押绝”的地步！甚至当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日本侵占山东的时候，一九一八年段祺瑞政府对日本提出霸占山东各项权利的要求，也表示“欣然同意”。后来，日本就以此为口实，坚持要占领山东，不愿将它归还中国。这是段祺瑞政府犯下的滔天的卖国罪行！

巨额借款的主要用途，是作为皖系军阀发动内战的军费。曹汝霖招供说：当时北京政府日常军政开支，每月需二千万元，而财政收入合计不到一千二百万元，“尚短八百万元，则藉借款为弥补”。段祺瑞利用日本的军费、军火，大肆扩充军队。日本军官替段祺瑞训练了三个师、四个旅的所谓“参战军”，作

为段祺瑞进行内战的主力。

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后，接受研究系首领梁启超的主张，拒绝恢复约法和已被张勋解散的国会。南方军阀则打起“护法”的旗帜，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推孙中山为大元帅，和段祺瑞相对抗。孙中山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抱着恢复约法和国会的目的，进行“护法”斗争。但是，当时人民需要的是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因此孙中山的“护法”，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象潮湿了的鞭炮一样，发不出声响来。不久，南方军阀与直系军阀相勾结，迫使军政府改组，排挤了孙中山。孙中山回到上海以后，悲愤地说：在护法军政府中，“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讎（音筹 chóu）所快”。他认识到，南北军阀是“一丘之貉（音禾 hé）”，处于绝望的境地。

段祺瑞决定对南方用兵，以实现“武力统一”。计划出兵攻占湖南，作为进攻两广的基地；攻占四川，作为进攻云南和贵州的基地。

一九一七年十月，段祺瑞派直系军队进入湖南，陆荣廷的桂系军队也开进湖南对抗。段祺瑞的阴谋是，消耗直系和桂系双方兵力，以坐收渔利，并夺取南方军阀的政权和地盘。而直系军阀冯国璋，则企图勾结南方军阀，挤走段祺瑞的皖系势力，窃夺北京中央政权。冯国璋因此提出“和平统一”的口号，指示进入湖南的直系军队消极息战。十一月，在湖南的直系军队自动退兵，发表宣言，要求停战。直隶、江苏、湖北、江西等省直系督军，又联合通电，主张与护法军政府和平解决。

段祺瑞被迫辞职，内阁随之垮台。

段祺瑞去职时，发出密电说：“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音阵 zhèn）兆。”段祺瑞和袁世凯一样，“朕即国家”的思想，已跃然于纸上。可是，他想“武力统一”，得到的却不是统一，而是分裂。

十二月，冯国璋任命倾向于直系的王士珍为国务总理，组成新内阁，表面上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但不久，王士珍将陆军总长的职位让给段祺瑞的亲信，并发表段祺瑞为“参战督办”。

日本政府决定支持段祺瑞完全夺回北京政权，拟订了几项具体的办法：一、设法令段祺瑞部下的督军活动；二、瓦解王士珍内阁；三、竭尽全力援助段祺瑞复职；四、支持段祺瑞统一全国。段祺瑞此后就是按照日本主子的办法，进行反直系冯国璋的活动，达到重新上台、出兵南方的目的。

这年十二月到第二年一月，段祺瑞再次策动皖系督军团在天津开会，主张对南方实行“武力统一”。同时，段祺瑞以副总统职位和两湖地盘为诱饵，引诱直隶督军曹錕，要他出兵进攻湖南，以瓦解直系实力。二月，冯国璋巡视南方，离开北京，段祺瑞派亲信在蚌埠拦车阻截，威逼冯国璋答应下令出兵才放行。冯国璋回到北京，只得下令任命曹錕等率兵进攻湖南。三月，段祺瑞又以给奉系军阀张作霖一批军火为条件，要张作霖派兵入关，威胁冯国璋。皖系督军团乘机联合发表通电，拥护段祺瑞复职。冯国璋被迫又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段祺瑞再次组织新内阁后，更加大肆叫嚣“武力统一”，直

系、皖系和奉系北洋军，号称五十万人，到湖南与湘、桂军作战。段祺瑞还从日本借款中，拨出一部分作为攻占城市的“犒赏”费。曹錕部将吴佩孚，率领第三师开仗后，为了扩充地盘和得到“犒赏”费，连续攻占岳阳、长沙、衡山等地。段祺瑞大为高兴，要亲往慰劳，电促吴佩孚乘胜进攻，直捣两广，以实现“武力统一”全国的迷梦。

但是，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只是为了扩充皖系的地盘，当吴佩孚攻占长沙后，段祺瑞迫不及待地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这使直系军阀曹錕、吴佩孚大失所望，极端不满，吴佩孚到衡阳后就按兵不动。曹錕为了守住自己的直隶地盘，于五月返回天津。六月，吴佩孚与湘军订立停战协定。八月，吴佩孚等通电主张和平，公开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的主张。段祺瑞发电报申斥吴佩孚，说他“节外生枝”，“破坏国家”。吴佩孚也发通电反击，说这样做是从段祺瑞那里学来的：“实由我师教育而来，并非节外生枝。”直系军阀纷纷通电响应，为吴佩孚壮声势。南方护法军军政府发表复电，也赞成和平。段祺瑞在直系军阀和南方军阀联合反对下，八月下旬被迫命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他的“武力统一”主张，宣告失败。

段祺瑞“武力统一”的主张失败后，决定转而先打击直系势力，驱逐直系冯国璋出北京中央政权。这时，正当新国会选举，段祺瑞从日本借款中拨出八十万元巨款，由亲信徐树铮（音争 zhēng）出面，收买喽罗，组成安福系（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徐树铮早年做段祺瑞的文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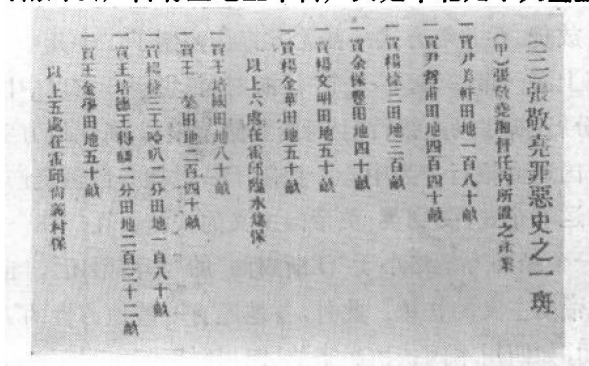
被段祺瑞推荐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一九一六年段祺瑞被任命为国务总理，徐树铮担任国务院秘书长；一九一七年七月，段祺瑞继续充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徐树铮为陆军次长，一直是段祺瑞的左右手。为了打击直系势力，事前徐树铮密电皖系军阀，要他们支持选举安福系的人。名为“选举”，实际上是指派，结果四百多名议员中，安福系占三百八十多名。九月，安福系控制的国会，以冯国璋代理总统期满为理由，改选另一个亲日派老官僚徐世昌为总统，冯国璋被逐出北京中央政府。此后，曹锟、吴佩孚与南方军阀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进一步取得美、英帝国主义的支持，成为直系军阀的新首领，继续与皖系军阀对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美国看到日本在战争期间对中国的侵略势力显著增强，积极谋求抵制。一九一八年七月，向英、法、日三国提议，联合组织四国银行团，共同对华投资，包揽贷款，不许一国独占。这是美国力求打破日本在对华借款上的优势，以便把联合投资权控制在自己手里。十月，美国又联合英、法，向北京政府和南方护法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们停战议和。在美、英、法三国压力下，日本被迫宣布停止对段祺瑞政府单独贷款，并同意南北议和。

一九一九年二月，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议和会议，一开始就讨论停战范围问题，接着又讨论借款问题，实际上是商议如何划分地盘，如何分配四国银行团准备给予的借款。在这些问题上，彼此争吵不休，到五月会议终于宣告破裂。

## 八、人民的苦难与反抗

北洋军阀的统治，是乡村豪绅阶级和城市买办阶级的统治，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各派军阀都是大地主、大买办，有的也是大资本家，是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代表。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在东北占有大片土地，又是龙烟煤矿公司和八个机器煤矿的大股东。直系军阀头子冯国璋，在苏北与张謇合办盐垦公司，占地达七十万亩，在南京等地设有几个钱庄，在直隶夹山、遵化、兴隆沟拥有金矿三处。徐世昌在河南辉县，占有土地五千亩，又是华北几个大企业的股



《湖南》杂志揭露军阀张敬尧的罪恶

东。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在东北有田一百五十万亩，还出资兴办煤矿。桂系军阀陆荣廷、谭浩明，在广西得势的时候，占有全道（相当于现在的专区）三分之一的土地。其他不少大小军阀，也有类似的情况，如皖系军阀张敬尧，在安徽霍丘占有土地七、八万亩。军阀集中的财富和土地，都是残酷掠夺人民而来，每个铜钱和每一寸土地，都印有人民的血迹。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买办资本也有所发展。它们依靠帝国主义和军阀，借助于政治势力，组成了几个买办资本集团。其中以梁士诒为头子的交通系集团，和以曹汝霖、陆宗輿为头子的新交通系集团，控制着铁路和交通银行等。此外，在北方有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等所谓“北四行”集团。“北四行”的创办人吴鼎昌、周作民，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员，梁士诒、徐树铮等又是“北四行”的董事。“北四行”是依靠北洋军阀的势力发展起来的，它除了经营银行业务，独霸华北金融，经理内债、外债和税收，为军阀筹集混战军费外，还通过投资、放贷、吞并等方式，在北方直接控制了二十几个工矿企业。在上海一带，兴起了一个“江浙财阀”集团，它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为中心，控制了一批拥有巨额资产的工、矿、航运等企业，受到英、美帝国主义的扶植。在广州一带，出现了一个经济力量略小于“江浙财阀”的“华南财团”，也受到英、美帝国主义的扶植。此外，各地还有一些地方性的买办资本集团，如四川军阀扶植起来的“四川财团”，山西军阀扶植起来的“山西财团”。买办资本集团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支持军阀，

帮助军阀进行割据和纷争，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各派军阀都大肆扩充自己的军队。一九一四年全国陆军不过四十五万七千人，一九一八年增至八十五万人以上，一九一九年初达到一百三十八万人。军费开支，仅就北京政府的军事预算来说，“五四运动”前的一九一八年，达二亿零三百万元，为辛亥革命前夕一九一〇年一亿零二百万元的一倍。军费占去国家财政收入的五分之四。

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军阀政府无止境地增加捐税，对人民进行疯狂掠夺。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九年，田赋增加了七倍，盐税增加了三倍，烟酒税增加了三倍，印花税增加了六倍。军阀往往任意增加赋税，不受任何限制。四川军阀还采取预征赋税的办法，进行搜括。四川梓潼的田赋，在一九二六年春竟被预征到了一九五七年，军阀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

军阀间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为残暴的蹂躏和掠夺。一九一七年，南北军阀在湖南混战，皖系的湖南督军傅良佐发布戒严令，剥夺人民群众集会、结社、居住、通讯的自由，宣布交战时可以破坏“人民之动产、不动产”，在交战地区军队“得侵入家宅”，或令居民“退出其家宅”。军阀在混战过程中，更是对人民进行公开抢劫，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一九一八年，皖系军阀张敬尧进入湖南平江城后，野蛮地屠杀人民，宣布“三日不封刀”。据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调查，仅湖南醴陵由于军阀混战，被灾的有四万七千九百零一户，死伤二万三千四百五十九人（其中被杀二万一千五百四十二人）。

在军阀统治下，广大人民没有丝毫政治权利。北洋军阀政府严禁工人罢工，在颁布的《暂行新刑律》和《治安警察条例》中，都把罢工、怠工规定为“犯罪”行为。实际上，军阀是用屠刀来对付工人罢工的，工人时常遭到无理逮捕和屠杀。北洋军阀政府通过“出版法”“报纸条例”等，把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等权利剥夺干净。不仅如此，军阀还在全国遍布特务，箝制人民的言行。

祸国殃民的军阀统治，使国家的情况一天天败坏，人民也被逼得生活不下去。全国人民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和维护生存权利，不能不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的斗争。

中国工人阶级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毛主席说：“中国工人阶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



军阀野蛮地屠杀人民

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sup>①</sup>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增加,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进一步壮大,从而加强了斗争的主观力量;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又使工人的斗争日益增长,因而形成为自发斗争高涨的时期。

中国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受到了更多的锻炼,觉悟程度有所提高。据统计,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工人罢工共达一百零八次。罢工遍及各地和各个产业部门,斗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愈到后来愈频繁。一九一七年《民国日报》记载说:“数月以来,罢工之声不绝于耳,以上海一埠言,已达十余起。”在较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中,斗争锋芒往往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如一九一五年上海“租界”人力车工人的罢工,日商上海第五纱厂工人的罢工,一九一六年上海太古、怡(音移 yí)和轮船公司船员的罢工,一九一七年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的罢工,一九一八年上海日华纱厂工人的罢工,都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而一九一五年湖南乾城大王岩煤矿工人的罢工和武装反抗,一九一六年北京财政部印刷厂工人的罢工,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人的罢工,都具有反对封建军阀的性质。一九一六年,天津法“租界”工人反抗法帝国主义企图侵占老西开地方的斗争,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并开始有了政治斗争的经验。反抗法帝国主义企图侵占老西开的斗争,既是反帝斗争,也是反对军阀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斗争。天津人民的反抗斗争从十月开始,充当这次斗争的领导者是

<sup>①</sup>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九八二页。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但是法“租界”工人从十一月开始罢工，工人阶级便成了这一斗争的主要力量。这次罢工坚持了五、六个月，给法帝国主义以巨大打击。

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军阀霸占土地，极力搜括财富，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使农民破产流亡。据记载，江苏昆山，一九〇五年自耕农占26%、半自耕农占16.6%、佃农占57.4%；但到一九二四年自耕农只占8.3%、半自耕农占14.1%、佃农则占77.6%。江苏南通，一九〇五年自耕农占20.2%、半自耕农占22.9%、佃农占56.9%；但到一九二四年自耕农只占13%、半自耕农占22.6%、佃农则占64.4%。这种情况，各地都相差不多。军阀、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日益加重，江苏南通和安徽宿县的谷租，一九二四年较一九一四年增加了50%左右；南京、江宁等二十七县的钱租，一九二七年较一九二二年增加了一倍以上。军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激起了全国农民的反抗。仅根据天津《大公报》和上海《时报》上极不完全的记载，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贫苦农民为反抗租税和暴政而掀起的斗争，共计六十八次，其中有人数记载的四十次，共约有三十三万七千多人。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反对十月革命、侵占中国东北，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又和段祺瑞政府订立《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通过这些“协定”，日本取得在中国驻兵，日本兵由中国负责供养，以及作战时日本得直接指挥中国军队的特权。日本派军队七、八万人开进东北，把侵略势力扩张到东北

北部，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留日学生决定反对军事协定，一律罢课回国。回国学生首先在上海、北京及各省组织救亡团体，展开各种请愿和宣传活动。此外，各地学生也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活动，情绪十分激昂。五月二十一日，北京学生曾赴总统府请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段祺瑞政府。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九一九年一月，中国作为参战国，派代表出席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巴黎和会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战胜国的分赃会议。会上，日本帝国主义坚持要由它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狼狈为奸，中国代表提出的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取消“二十一条”等要求，却被和会无理拒绝。北洋军阀政府竟准备在宰割中国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全国人民群情激愤，于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了。

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一致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这时任交通总长）、陆宗輿（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这时任币制局总裁）、章宗祥（这时的驻日公使）。游行队伍到达赵家楼，冲进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躲藏起来。群众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并放火焚烧曹宅。从这一天开始，运动迅速由北京向全国发展，天津、上海、长沙、济南、武汉、广州等地的学生，也纷纷声援，举行示威。



五四运动在开始的时候，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军阀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到六月三日，在北京已逮捕了近千名学生，其他城市也随着进行逮捕和镇压。在这严重时刻，中国工人阶级挺身而出，站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一线。六月五日，上海工人发动大罢工，参加的各业工人六、七万人，加上手工业工人、店员等，达十多万人。六月十日，罢工达到高潮。沪宁、沪杭、淞沪等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上海水陆交通全部断绝。接着，唐山、长辛店、天津、长沙、济南、南京、武汉、杭州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游行和罢工。在工人、学生的推动下，上海和全国各重要城市商人，也举行罢市。

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显示了强大威力，成为五四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主力军。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三个卖国贼，并于六月二十八日宣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毛主席指出：“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sup>①</sup>从此，中国进入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sup>①</sup> 《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二页。

## 九、北洋军阀的覆灭

习惯上称为中国近代史的，是指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因此，我们编写的这本《北洋军阀》，主要是介绍五四运动以前北洋军阀的历史；五四运动以后到北洋军阀的覆灭，就只在这里简单地概述一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侵略重新加紧，美、日矛盾随之尖锐起来。美、英帝国主义进一步支持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与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皖系军阀段祺瑞相对抗。一九二〇年七月，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和西南军阀，并利用五四运动以后皖系军阀声名狼藉，和全国人民反对皖系军阀的革命情绪，发动了直皖战争。

直皖战争爆发后，日本公开支持段祺瑞，美、英帝国主义支持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因对皖系向东北和蒙古扩张地盘不满，也陆续派军队入关对段祺瑞作战。皖系由段祺瑞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任总参谋，段芝贵任前敌总司令，分兵三路进攻直系军队。直系由吴佩孚、王承斌任正副司令。七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两军在直隶的涿（音桌 zhuō）州、高碑店、琉璃河等

处激战。直系把皖系军队主力曲同丰部队打败，全歼四万余人，曲被俘，其他皖系军队纷纷崩溃。直、奉联军向北京进发。十九日，段祺瑞通电辞职，徐树铮等逃往日本使馆。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势力，从北京政府中被驱逐。皖系军阀武力，除浙江的卢永祥外，全部被打垮。

直皖战争以后，在一个时期内，直奉军阀把持北京政权，充当美、英、日帝国主义共同支配的工具。但是，这种局面只是暂时的，美、英与日本的矛盾依然存在，美、英帝国主义竭力支持直系军阀，日本帝国主义则起用自己的另一个工具——奉系军阀，为它效劳。这就造成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之间的争夺和战争。

直奉军阀的争夺，从直皖战争结束后就已经开始。他们互相争夺军火和地盘，特别是对北京中央政权的争夺，非常激烈。一九二一年五月，在张作霖奉系军阀的支持下，亲日派买办官僚梁士诒组阁，遭到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反对。一九二二年四月，直奉军阀经过明争暗斗，各自备战之后，爆发了直奉战争。直奉两军在长辛店、固安、马厂等地激战，到五月初奉军战败，经英国人德库脱尔（奉天的传教士）“调停”，奉军撤出关外。不久，张作霖用东三省议会的名义，通电“自治”，自称东三省保安司令，继续盘踞东北。梁士诒内阁随之垮台，梁士诒等被通缉，逃往日本。北京政权遂为直系军阀所独自窃据。

直系军阀在窃据北京政权后，一面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一面实行专制独裁，高唱“武力统一”，以镇压人

民和消灭异己。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大罢工，残杀工人四十余人。当他们自以为统治地位已经“稳定”的时候，就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如同袁世凯在死亡前演了一出称帝丑剧一样，直系军阀的首脑曹锟，在美帝国主义一手导演下，也演了一出贿选总统的丑剧。

为了选上总统，曹锟对国会议员以五千元一票的高价进行贿赂，受贿的议员被人们称为“猪仔议员”。曹锟又指使直系的各省督军及将领，向国会发出限期选举的通电。在种种利诱加威逼之下，“猪仔议员”终于在一九二三年十月五日把曹锟捧上总统“宝座”。随后并通过了一部污秽不堪的“曹锟宪法”。

曹锟贿选，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对曹锟、吴佩孚，反对直系军阀的运动。

在全国人民反贿选的高潮中，奉系、皖系军阀利用人民反对曹锟、吴佩孚的情绪，否认曹锟的总统资格，与曹锟、吴佩孚对抗。盘踞在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首先发出不承认贿选总统的通电，奉系军阀张作霖继起响应。曹锟、吴佩孚则以“中央”的名义，要讨伐他们。于是，一九二四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

一九二四年的军阀混战，是从江浙战争开始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除在北方以重兵防止奉系入关外，在南方则派孙传芳进入福建，与江苏、江西、安徽的直系军阀，四面包围浙江的卢永祥。一九二四年五月，孙传芳夺取福建后，从

而实现了对浙江包围的计划。江苏属于直系齐燮（音谢 xiè）元的地盘，但上海却为卢永祥所控制。江苏的齐燮元与浙江的卢永祥，从一九二三年冬以来，就为争夺上海而不断发生冲突。一九二四年九月，齐燮元以卢永祥收纳被孙传芳击败的福建军阀为借口，电请曹锟下令讨伐卢永祥；同时和孙传芳联合，从江苏、福建两面发动对卢永祥的军事进攻，爆发了江浙战争。经过一个多月混战，十月十三日卢永祥战败，逃往日本，江浙战争结束。

江浙战争爆发后，张作霖就通电指责曹锟、吴佩孚，并于九月十五日出兵向直系进攻。吴佩孚出兵迎战，在热河、冀东到山海关之间，展开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时，直系将领冯玉祥与胡景翼，因受吴佩孚的压制和反对曹锟、吴佩孚的革命形势影响，从前线撤兵回北京，和驻防北京的孙岳配合，发动了北京政变。冯玉祥等部称“国民军”，树起反对曹锟、吴佩孚的旗帜。控制北京后，囚禁曹锟，改组内阁，曹锟、吴佩孚的统治迅速瓦解。十一月初，吴佩孚率残部由大沽口乘船溃逃南下，继续窃据湖南、湖北地区。北方落入奉系和“国民军”的控制之下。

除了以上三次大规模混战外，还有：一九二五年十月，当时另树一帜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发动对奉系军阀的战争。奉军战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被孙传芳盘踞。一九二六年一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日、英帝国主义撮合下，取得“谅解”，联合进攻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国民军”逐步放弃开封、郑州、天津、北京等地，最后退往西北。

在军阀混战期间，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也象走马灯一样，不断地更换。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八年，十六年当中就更换了四十七届内阁。其中寿命最短的，只有六天。

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迫使广大人民群众已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孙中山曾经领导过多次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结果都失败了。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诞生。毛主席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sup>①</sup>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勇敢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

一九二四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一九二六年，一个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北伐战争爆发了。

北伐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准备的结果。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

<sup>①</sup>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〇三页。

大的人民解放斗争。”<sup>①</sup>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非常高，因此获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毛主席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

一九二六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锋部队，向湖南挺进。七月一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出“北伐宣言”；九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

北伐大军根据敌众我寡和军阀内部充满矛盾的情况，分三路进军：一、向湖南、湖北进军，打倒吴佩孚；二、向江西、福建进军，消灭孙传芳主力；三、向浙江、江苏、安徽进军，彻底消灭孙传芳。计划在打倒吴佩孚、消灭孙传芳后，再考虑在适当时机消灭张作霖。

当北伐军胜利进军时，退处西北的“国民军”，在革命形势影响下，宣布脱离北洋军阀系统。九月，“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后，除留一部分抵挡由京包铁路西攻的奉军外，全部进入陕、甘地区；一九二七年初，又由陕西出发，和北伐军同时进攻河南。

北伐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工农群众运动的配合与支援下，不到十个月时间，就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分，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北洋军阀数十万军队，摧毁了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在半个中国的反革命统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sup>①</sup>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九三六页。

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面对着这种形势，帝国主义加紧进行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一面出兵镇压，一面分化革命阵线。

北伐战争开始时，帝国主义援助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镇压革命。一九二七年初，各帝国主义国家调遣海陆军，加上所谓万国商团和巡捕，共三万人以上，集中于上海，企图阻止上海工人起义和北伐军进军。三月，北伐军占领南京的当天晚上，英、美帝国主义命令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对南京革命军和居民开炮轰击，结果死伤两千人，制造了“炮轰南京”事件。这个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对。

帝国主义还采取了分化革命阵营，寻找新走狗以代替旧走狗——北洋军阀的手法，破坏中国革命。帝国主义很快就物色到混在革命阵营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

革命形势的发展，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激烈了。一九二七年初，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他根本拒绝毛主席的正确意见，放弃了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对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北伐军总司令的职权被蒋介石窃取，他一路上招降纳叛，收编军阀部队和土匪，扩大反革命武装；在占领南昌以后，又开始公开镇压工农，杀害共产党员。而陈独秀在统一战线中，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正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下，革命领导权被蒋介石所篡夺。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



反革命政变；七月十五日，汪精卫也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蒋介石建立了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北洋军阀的许多头目，都投靠到蒋介石的门下，当上了国民党的军长、师长。

一九二八年四月，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国民党新军阀开始对奉系军阀展开争夺地盘的所谓“北伐”。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于六月放弃北京，退出关外。日本帝国主义见张作霖失败，阴谋另行制造一个分裂中华民族的“满蒙帝国”，决定抛弃走狗张作霖。张作霖乘火车逃回东北，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就被日本特务炸死。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在美国驻华大使马克谟的策划下，发表所谓“改旗易帜”的通电，加入国民党新军阀的队伍。

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终于在人民革命力量的打击下，最后覆灭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地主买办阶级，就扶植蒋介石作为它们新的代理人。从此，北洋军阀的反革命衣钵，被蒋介石国民党新军阀继承下来。这个新军阀统治的阶级实质，同北洋军阀是完全一样的，正如毛主席在一九二八年十月所指出的：“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sup>①</sup>

①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四七页。

